

## 爱德华·萨义德：以人文介入政治\*

李 意

**摘 要：**爱德华·萨义德是著作等身、卓有创建的杰出学者，他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于一身，是公认的后殖民理论的重要奠基者。萨义德的创作可分为“文学—政治—人文主义”三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他不仅关注历史问题研究，还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交叉关系，并提出了“既是政治的，同时又高于一切理论术语”的概念模式，坚定地选择了以人文介入政治的艰难道路。萨义德不仅指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关系以及人文知识话语介入其中的可能性，同时也指明了在历史与政治的双重道德面前，知识分子应“向权力说真话”。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身份、话语和政治为主线，通过挖掘他相关作品中流露出的思想，以期带给读者深入思考与启迪。

**关键词：**爱德华·萨义德；文化身份；中东政治；话语

**作者简介：**李意，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5-0069-06

**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2 资助。

被誉为“巴勒斯坦之子”的爱德华·萨义德是位著作等身、卓有创建的杰出学者，他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于一身，在人文科学领域中产生了典范效应，被公认为后殖民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在公共领域，他是美国当代少数具有深刻批判意识的著名学者，也是巴勒斯坦乃至中东在西方的主要代言人。每当巴勒斯坦或中东发生重大事件时，西方媒体和大众都希望知道他的看法，他俨然成为中东局势与相关政策的意见领袖。数十年来，萨义德积极结合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以人文介入政治，真正做到了永远不对权威妥协，永远在边缘审视和发言，并且永远有勇气参与到活生生的历史之中。

萨义德一生漂泊，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感受，对我来说非常强烈。事实上，贯穿我人生最强烈的那一条线就是，我总是处在事情之内和之外，从未真正很长久地属于任何东西。”<sup>[1]95</sup>这种强烈的不安定总是萦绕着萨义德，对他来说，真正感到担心的不是病痛和死亡，而是如何重新捕捉、述说和诠释生命中有价值的内涵。本文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身份、话语和政治为主线，通过挖掘他相关作品里流露出的思想，以期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与启迪。

### 一、文学研究的政治意义

纵观萨义德的创作生涯，我们可以将萨义德思想和作品标记为“文学—政治—人文主义”三个阶段，其中，“文学”与“政治”两个阶段之间的分界非常明确，那就是1967年这道分水岭，从那以后，他就坚定地选择了人文介入政治这条道路。

1967年战争是萨义德政治生命中的重大事件。“在那之前，我是循规蹈矩的学院人士，做的都是

些规规矩矩的事……然后在 1967 年，我所知道的那个世界完全分崩离析。以色列人占领了更多的巴勒斯坦——西岸和加沙地带——而我突然发觉自己被扯回到那个地区。我从来没有教过中东文学——我教过一些英文翻译的阿拉伯著作，但基本上我的全部工作就是西方文学。从此，我开始要逐步适应我的历史中那些多少被压抑或排斥的部分，也就是有关阿拉伯的部分。”<sup>[2]</sup>的确，1967 年的中东战争彻底改变了中东局面，萨义德也由此深深卷入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中东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从那以后，萨义德开始从单纯的文学创作转向政治行动主义。为了巴勒斯坦各方权益的斗争，他开始了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写作。萨义德用英文和阿拉伯文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论文、报刊杂志的政治评论、新闻分析，并在世界各大媒体和阿拉伯媒体上发表言论，严厉抨击新老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场所，把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愿望昭示给国际社会。

写作是萨义德参与政治最为直接的方式，但与切实的政治活动相比，写作只能是一种“退避的低姿态努力”，它代表了行动主义的限制。不过，行为的不可重复性和遮蔽性使写作变得极为重要，它是重要的再现手段。对于真理和事实的坚持，促使萨义德以人文介入政治，向非正义政治及其权力集团进行严厉的批判。1968 年，萨义德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投身校园里的反越战活动，那个时代也恰好是巴勒斯坦运动开始出现之时。这是萨义德第一次介入巴勒斯坦政治，也是他第一次开始写有关政治的东西。他的第一篇政治论文《被描述的阿拉伯》发表，从此他对此议题的政治论著和思考就从未间断过。从 1970 年开始的 12 年间，萨义德以流亡者的身份，介入巴勒斯坦政治。通过富于创新的著作、正式的公共演讲以及日常的教学，他深刻地改变了世人看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改变了他们看待整个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方式。1978 年出版的《东方学》把萨义德最感兴趣的两件事结合起来：一边是文学和文化，另一边则是对政治和权力的研究与分析。可以说，《东方学》及后来的一系列作品其实就来自那段时间的经验。

关于文学研究的意义，萨义德指出，文学研究将过多的精力花在了诸如界定什么是纯文学（purely literary）的问题上，而这没有多大价值，“文学之所以有趣，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与其他东西混杂在一起，而不是因为它的纯粹性”<sup>[1]102</sup>。对文学观念的认识表明了萨义德与形式主义的文本观所持的不同意见，他不断强调文本的“世界性”，实质上就是强调作为人文研究的主体，不能仅仅关注文本本身，将文本看作一切，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的政治关怀，这不仅是知识兴趣的问题，更是人文研究或文学研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萨义德批评美国文论研究界的状况时指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语义学、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等理论都与它们所关涉的现实失去了联系，它们已经不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新情况。”<sup>[3]</sup>这也体现在他对学生的要求上：“我的学生不再对理论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构成了 20 世纪晚期的历史，他们对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形色色的权威，各种类型的解放与独立进行文化的、美学形式的和话语的思考。这正是我所做的。”<sup>[1]110</sup>

当然，也有人认为，对于文学研究的政治意义有过高的期许是无稽之谈，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文学研究材料或者最终进入图书馆而成为无人问津的历史资料，或者作为某种文学传播过程的中介对阅读活动产生极为有限的作用。在大多情况下，“文学研究的现代历史是在文化民族主义的范围内进行的。文化研究的首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经典，然后去维系它的卓越、权威和美学特性。”<sup>[4]89</sup>好像只有这样，文学研究才能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构建的手段。但萨义德似乎无意成为形式主义或者唯美主义者，他更在乎巴以和平前景与故国安危这些现实的政治问题。对于像萨义德这样的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来讲，文学研究的政治意义在于研究主体对社会历史政治事务的关注和参与，这种参与不是毫无历史和现实感的游戏之举，而是有深刻影响力和内涵。萨义德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甚至将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纳入到对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当中。

## 二、语言、知识和社会政治

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语言便进入国际关系理论，其中以后结构主义最为典型。该理论认为，语言本身就具有行事性，语言造就行动。它强调话语，强调文本和对文本的解构，把语言作为理解不同社会现实的起点，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更加关注语言的解构作用。<sup>[5]12</sup>

文学写作，就它与历史的特殊关系而言，为历史理解与当代变化、个人行为与集体意见之间的矛盾、政治现状与革命运动之间的物质与非物质张力关系提供了一种载体。虽然记录人类思想与行为积淀的其他方式都围绕着写作进行，但由于一些显而易见的技术和历史原因，对这些测绘世界的过程进行的审查一直与文学阐释紧密相关。为了能够对其中的一些张力关系作出清晰的描述，萨义德写了不少批评论著，如将《开端》与《世界、文本与批评家》这类探讨文学理论的著作与政治问题相结合，引发了广泛的政治思考与争论。

毫无疑问，在萨义德所有作品中，《东方学》最具影响力：萨义德在这部书里集中而系统地考察了理论与政治、文学与文化的联结关系。这一论著对如何理解文学传统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其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语言的历史性能，说明了语言如何通过社会机构和知识生产发挥其政治力量。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反复阐述这样一个道理：东方概念是一个源于语言，经过历史演义而逐渐复杂化的建构物。在最初阶段，这只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随着无数文本对它进行描述、拟人化，并赋予某种意图，这个概念逐渐变得形象具体，以至于到最后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发明。于是，对“东方主义”历史阐释的隐含意义超越了其他任何一种比喻，但理解其原理却不容易，其主要困难来自分析这个比喻时所产生的复杂性。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暗示的那样，“与西方一样，东方是一个概念，它具有历史、思想传统、意象以及词汇，这些东西使这一概念在西方成为一种现实，且为西方而存在着。”<sup>[6]11</sup>可以说，东方是历史积累的产物。一旦被转录收编，它就成为用于展开竞争、联合各种话语的一个参照点，并形成自己的框架性结构。各种各样的比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界定的关系，它们互相补充又在彼此对立中相互融合，这使得指涉关系交叉重叠，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因此，对这种比喻产生的过程进行阅读和阐释，就意味着对“整个利益网”进行解码，对伴随比喻产生的“思想群体”作出妥协，同时还是与支撑起比喻的各种话语的“集合力量”面对面的过程。

可见，比喻的构造系统验证了“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说法。如此一来，文化话语传播的并不是“真理，而是表征”<sup>[6]21</sup>。把关于语言的思考引入历史研究，目的在于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与认知和知识的政治含义一样，东方即便作为一个受控于历史的概念，除了表明物理意义上的被征服状态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个认识论问题。语言的本质决定了话语对历史真相产生的限制作用。从这一思路出发，萨义德为我们做了总体概述：“东方学中出现的东方是由许多表述组成的一个系统，这些表述受制于将东方带进西方学术、西方意识，以后又带进西方帝国之中的一整套力量。如果说对东方学的这一界定似乎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其原因正在与东方学自身乃某些政治力量和政治活动的产物。东方学是一种阐释的方式，只不过其阐释的对象正好是东方，东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sup>[6]258</sup>无独有偶，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曾在《论道德之外的真理与谎言》中针对语言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它揭示了批评实践活动中政治问题与认识论问题相互纠结的现象。显然，这也是萨义德《东方学》一书论及的一个主要观点，即语言、知识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这三者都很重要，不存在孰轻孰重。可以说，尼采的思想对萨义德作品以及批评思想有很大影响。在他们看来，支撑真理概念的框架是语言，而历史真理一旦脱离这一强大的支架，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语言，因其固有的物质性，成为政治和理论领域里统帅各种互不相干成分的共同标准。因此，历史理解的全部活动都依赖于由语言决定的指涉模式。<sup>[7]122</sup>

除了关注历史问题外，萨义德还强调文学与政治的交叉关系。他竭力向世人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用于文学阐释的工具性概念不仅可以用于描述文化领域的现象和产生，而且还是对这些现象的产生根源、历史意义以及社会现象做出解释的必要工具。<sup>[8]103</sup>在这种语境下，萨义德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既是政治的、同时又高于一切理论术语”的概念模式：一方面，他紧随当今文学观念的发展趋势，摒弃了笼罩在文学表面的意识形态雾障；另一方面，他以文学反思为基础并将它重新引入批评领域。这一理论反思将文学理论、语言生产理论与政治利益分析相结合，必然引发人们对历史可能存在的物质理解提出质疑。人们于是发现，各种术语、关注点、（文学）思考或阐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社会、政治和物质因素的不同而不同。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解释有其理想化的一面，甚至具有意识形态作用。因此，它必然涉及文本外的干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

“政治”，它涵盖了一系列制约因素，包括军队、权力或机构等。

21 世纪初，历史干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这一历史转折点决定的。目前，各种世界观相互碰撞，而各种技术手段又对这些观念形成增加或削减作用。萨义德对东方概念的真理进行的细致解读不仅消除了人们对东方主义固有的幻象，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一概念发展至今的缓慢历程，并指出这一发展过程蕴含的意识形态基础，正如他所言，“对客观性和权威性的批判已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它揭示了世俗世界里人类怎样建构真理，比如通过对白种优越这一所谓的客观真理进行解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优越性的建立和维护都源于欧洲殖民帝国对非洲和亚洲人民的征服。”<sup>[9][91]</sup>的确，东方无法表述自己，它总是被表述，被西方的话语权威所慑服。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要表述的似乎就是这样一种现实，欧洲在殖民行动前后发明或曰虚构了有关东方和东方的想象，进而这种表述又成功地作为一种工具被用于殖民主义的征服和控制中去。

### 三、萨义德对文化身份的思考

语言具有建构性，客观事物、主观事物、自然事物和社会事物等正是通过语言的建构才被赋予了特定的意义和身份。<sup>[10][18]</sup>语言通过对身份和对外政策的建构而不断产生意义，形成一定的话语，话语把身份的表象和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话语产生了身份，身份和政策相互影响。对外政策取决于对身份的表述，身份同时又通过政策的形成和合法性而得到建构和再造。<sup>[11]</sup>可见，身份并不是国家或个人本身的特点，而是话语的产物。对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特殊行动的合法性，并通过话语表达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关注这些关于身份和政策的话语。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通常人们会建构一个“我”(Self)或是“我们”的身份，同时也建构一个“他”(Other)或“他们”的身份，将其作为表述政策的基础。语言本身具有结构性，语言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对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尤其是身份起重要作用。如“恐怖主义”的意义和身份是通过和“自由的保卫者”的身份对比而形成的；“不发达国家”的意义是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对比而形成的等等。这些身份通常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相关性体现出来。除了这种结构性外，话语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内部会呈现出不稳定性。正因如此，政治家们通常会努力使自己的某些话语稳定化，以逐渐排除其他的话语。语言的这些特点也把政治的施动性、话语的建构和再造功能以及话语所建构的身份提到了核心地位。<sup>[11]</sup>萨义德的“中东三部曲”<sup>①</sup>令他在美国学术界甚至世界上声名鹊起。这几本书的主要经验和例证都来自中东，这是萨义德出自强烈的边缘身份意识，作为一名具有无可逃遁的阿拉伯身份的人，站在更高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试图消解西方对东方阿拉伯的涂抹与假设的一种努力。

有差异就有权力运作关系。西方向来在与东方的差异比较中稳居强势权力的一方，因而他们对东方的话语表述自然自大地以自身文化的偏见和结构施加规则于“相形见绌”的对象，形成支配性的文化霸权表述，包括学术上、观念上和思维上的有关东西方之间的支配关系与霸权关系的话语模式统统在内。<sup>[12][620]</sup>萨义德列举了西方人笔下的东方，后者充满了异国情调但同时又是罪孽的，神秘而古老，保守而不可思议；东方是血腥的，恐怖的，贫穷的和荒蛮的。东方人被表述为缺乏理性、肮脏、好色、懒惰和贪婪，东方被小丑化、女性化，被西方人当作猎奇的对象。<sup>[6][203]</sup>总之，东方有他们所能想象出的一切奇闻轶事。这些他者形象并非源自东方经验的产物，它是服务于西方主体立场，先在地存在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虚构中，并在西方独有的想象中被夸大进而强加给东方的。这种被创造出的他者形象似乎已经成为西方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们在随后的文化心理中被标签化、脸谱化，成了完全僵化、一成不变的刻板形象。东方主义者通过对这些他者形象不厌其烦地复述，别有用心地引用与转述，当然有时也是纯粹的重复，必然会将这种虚构有时甚至是无知和自欺的断言上升到事实的层面。正如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以事实的名义对传说进行多次声称，那么传说就会变得比事实更显真实和重要，最终事实会被淹没在虚构中。东方主义对东方的表述使东方丧失了自我意识，自然也不会实现文化身份的认知，从而完全成为他者身份，成为一种

① 这三本书分别是：《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和《报道伊斯兰》。

缺场的在场 (presence as absence)。对东方及东方人来说,不在之在,何以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在被西方表述成为西方他者时,总是基于一个对位的原则。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形象,其身份越偏离其自我认证,越被扭曲为其自我意识的对立面,就越能在对位原则上强调西方的文化优越性。例如东方是缺乏理性的、保守的,西方就必定是理性的、进步的。于是,东方被西方彻底击溃,东方的这种他者身份极大地取悦了西方的自大心理。从而也证明了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都是自恋”的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正如萨达尔所描述的那样:“东方总是他者的标尺,是表明西方文明之优越性的永远的证据,也永远在证明西方统治非西方的合理性”<sup>[13]170</sup>。

不可否认,萨义德在文学和批评两方面的实践十分引人注目。透过萨义德的言说和著述,读者可以感受到各种维度,譬如时间(历史)和空间(世界)的维度——这是任何一个有深度的思想者都会有独特认识的两个最基本的维度。此外,他有很多涉及具体事件和问题的政治评论,也都包含着未曾言明的维度,它们使他的政治评论不同于一般的就事论事的报刊文章。这些维度若隐若现,互相交错,如“历史主义”、“正义”等等,虽然不是萨义德首创或专用,但他对它们的选择、强调、运用和组合,是那样的形象鲜明和恰如其分。可以说,萨义德的这些思想,与其疏离的特殊身份和心理感受不无关系。他在南非开普敦大学的演讲中提到:“我是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是个美国人,这其中所赋予我的双重角度即使称不上诡异,但至少是古怪的。此外,我当然是个学院人士,这些身份中没有一个是隔绝的。每一个身份都影响、作用于其他身份。因此,我必须协调暗含于我自己生平中的各种张力和矛盾。”<sup>[11]387</sup>当然,这种身份的设定并不是为了排除“异己”(即“异”于自“己”的他者),而是为了更宽广的人道关怀,正如他在另一篇访谈录中所说的:“一方面你争取代表自己的权利,要有自己的民族性;但另一方面,除非这些是连接上更宽广的实践(也就是所谓的解放),否则我是完全反对的。”<sup>[1]428</sup>萨义德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将痛苦转化为一种既能在帝国的中心求得生存,又能发出批判声音的强大动力。于是,受萨义德等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的启发,大批远离故土、流落他乡的知识分子也从自己的流亡经历中发掘丰富的写作资源,从而使得“流散写作”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为研究全球化和后殖民问题的学者所重视。

在萨义德的作品中,作者将看似独立的文学文本与文化事件逐个铺展剖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的世界。但在萨义德看来,知识并非只是身外之物,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将“文化和历史现象处理为有血有肉的人类产品,而不仅仅是一种冷冰冰的逻辑推理,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文化产品、政治倾向、国家与具体现实之间的联系。”<sup>[6]20</sup>萨义德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些思想,自然与他生活经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他强调身份建构、知识具体可感性和学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 四、结语

萨义德毕生的努力显示了人文学术、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从《东方学》到《知识分子论》,再到《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他的文学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社会评论中又包含人文精神,这和他的为人一样,永远是复杂而又统一的。萨义德不会像乔姆斯基(Chomsky)一样直接对抗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那样太简单、太直接,也不能跳出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但他更反对罗蒂(Richard Rorty)那样的后现代政治表述方式,因为罗蒂极少介入现实,习惯于通过呼唤大家回到黑格尔和杜威,用反讽的逻辑证明独断论的荒谬。萨义德认为,罗蒂树立的论敌都是虚幻假想的,他轻易地将它们击败,却对严酷的现实毫无影响。<sup>[14]39</sup>萨义德在批评的情感和态度上把自己与这两位学者区分开来。乔姆斯基在道义上取得成功,罗蒂在逻辑上赢得胜利,两者都拥有极多的崇拜者,萨义德却选择了一条矛盾的道路。他坚持用知识分子的方式,从文化上去接触最残酷的现实,在哲学逻辑中竭力表达自己的热情。尽管注定不可能在论述中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却。悲观源于思想,乐观源于意志,正如萨义德自己所描述的:“我不是不可战胜,只是永不服输。”<sup>[15]</sup>

总之,萨义德以其特有的姿态站在当代各种知识政治论争的前列,他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开拓性研究,对于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积极介入,对国际政治以及当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政治中的角色功能作出的一系列反思,使他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有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埃森·布朗厄

(Ethan Bronner)认为：“你并不一定要同意或者尊敬萨义德，（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最富有见地的文化批评家之一，他还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是写了十几本著作的作家。他在美国从事于一场承认巴勒斯坦人、穆斯林、阿拉伯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孤独而又是正义的战斗。萨义德在病榻上、在他的政治活动中，都会发出真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些声音在那些经常是照本宣科的和不诚实的国际性争端中是深刻的、丰富的和鼓舞人心的。”<sup>[16]</sup><sup>16</sup>

####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W.萨义德. 处于公众生活十字路口的文学理论// 薇思瓦纳珊.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 单德兴,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 [2] Edward W. Said. Identity, Authority and Freedom: The Potentate and the Traveller //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M].1991.
- [3] 爱德华·W. 萨义德. 写作与祖国[J]. 观点(阿拉伯文), 1999(2).
- [4] Edward W. Said. Sharpening the Axe[N].Al-Ahram Weekly Online, 2001-07-05.
- [5] Francois Debrix. Language, Nonfound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rancois Debrix. Language, Agency, and Politics in A Constructed World[M]. Armonk and NY: M.E. Sharp, 2003.
- [6] 爱德华·W. 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99.
- [7] 特里·考克兰. 语言问题//保罗·鲍威. 向权力说真话: 萨义德和批评家的工作[M].王丽亚, 王逢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8]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Reconsidered” [J].Cultural Critique, No.1.
- [9] Edward W.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M]. New York: Pantheon, 1994.
- [10] Lene Hansen. Security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M].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 [11] 孙吉胜. 话语、身份与对外政策——语言与国际关系的后结构主义[J]. 国际政治研究, 2008(3).
- [12] 张兴成.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与东方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13] 齐亚乌丁·萨达尔. 东方主义[M]. 马雪峰, 苏敏,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 [14] 爱德华·W. 萨义德. 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M].朱生坚,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15] Michael Wood. On Edward Said[J].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003-10-23.
- [16] Ethan Bronner. Voice in the Wilderness[J].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000-04-16.

## Edward Said: Human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ffairs

LI Yi

**Abstract** Edward Said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as an important post-colonial founder, he se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tical concern in one. Said's Publica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Literature- Politics-Humanism". In the latter two stages, he not only concerned about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issues, but also stressed the cross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then put forward a conceptual model of "not only political, while above all the theory the term". Said not only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plexity of the Socio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knowledge, but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ellectuals should "speak the truth to power" facing the double morality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A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dentity, discourse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will excavate Said's thoughts and give readers deep reflection and inspiration.

**Key Words** Edward Said; Cultural Identity; Mid-East Politics; Discourse

(责任编辑: 孙德刚)